

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与国家统一意识的重建^{*}

陈 彩 云

在面临“夷狄”交侵的危机情势下，南宋士人视中原为被窃据的故土，认为那里的华夏文明遭受了严重破坏。宋元易代后迎来了和平局面，南北交通重新开放，南方士人带着对故土的挂念，前往中原旅行考察，既缓解了易代的焦虑，也逐步认可了元朝的正统地位。南方士人在中原的旅行考察，并非只是寄情山水的游览活动，而是有着鲜明的舆地治学取向和现实关怀。他们通过对中原自然山川与历史古迹的考察，追寻失落的华夏历史记忆，唤醒了内心的中原认同，再次确认了中原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可以说，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记忆是南方和中原的精神纽带，在元朝统一的背景下，南北逐步重建起共同分享并认可的统一意识，对后世中国人的统一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元代 中原旅行 历史记忆 统一意识

作者陈彩云，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邮编 321004。

统一意识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①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度由草原游牧民族肇建的大一统王朝，其构建了空前辽阔的疆域，深刻影响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间认知。^② 然而在元朝疆域内，生活着不同宗教信仰、历史认同、语言文字的多元族群，“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③各族群对元朝统一有着多元且歧异的认知，往往受到地方意识、华夷观念、南北差异等因素的挑战，这种局面成为元初多民族政权构建的重大难题。不仅蒙古人、诸色目人与汉人对于统一的认知不同，就是同属华夏的“汉人”和“南人”，对于元朝的统一也有着不同的心理情感。原来的南宋军民坚信“夷狄无百年运”，在诸场合宣扬“夷狄”不会受到上天眷顾，唯有南宋才能延续华夏正统。^④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族群政治与元初江南统治研究”（项目编号 19BZS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白寿彝认为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有“统一意识”的传统，得到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认可，即便在诸政权分裂割据的时代，如三国、南北朝、宋辽金对峙期间，统一意识也始终存在（白寿彝：《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几点体会》，《史学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而学者认为中国史上的统一王朝不仅要实际拥有符合“天下”认知的广大领土，同时要具备与之匹配的思想基础（杨念群：《论“大一统”观念的近代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

^② 陈彩云：《元朝疆域观演变与多民族国家的空间认知》，《民族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③ （元）许衡：《时务五事》，（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 13《奏议》，《中华再造善本》第 744 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 册，第 2 页 b。

^④ 方震华：《“夷狄无百年运”——运术论与夷夏观的分析》，《台大历史学报》2017 年第 60 期。

宋蒙双方的舆论宣传反映出双方对统一战争的性质有着不同理解,也使得南北方对元初统一有着迥异的认知。萧启庆指出“汉人、南人的历史经验不同,族群意识的强弱因而不同,汉人经历契丹、女真的统治达数百年,族群意识不强”;“反观南人从未经历异族统治,蒙元灭宋,不仅是朝代更替,还牵涉到‘由华夏入夷狄’的春秋大义”。^① 李治安认为经历辽、金、宋等政权数百年的军事对峙,生活在中国南北两大区域的民众已经陷入分裂,北方士人蔑视南宋政权,对南宋联蒙灭金有着强烈愤恨的情绪,金末士人领袖赵秉文还以“岛夷”“蛮夷”称呼南宋。李治安认为长期的南北分裂对峙“会使‘汉民族’内部因地域界限发生裂痕,也会给民族感情和心理带来一些阴影”。^②

元朝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的多政权并立局面,为弥合南北隔阂提供了契机。姚大力指出元朝不仅建构出超越汉唐的辽阔疆域,而且还打破几百年“天限南北”的格局,使得国内各民族及文化之间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互相交往、学习、融合的机遇,并以南宋理学北传、杂剧南传作为例证。^③ 文化交流活跃的背后是南北方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元初统一后,南方士人得以回到中原^④进行旅行考察,这里的自然山川、名胜古迹不仅是有形具象的地理空间,同样也是蕴含着厚重历史过往的记忆载体。他们旅行访古,从山岳到河川,从城邑到宫阙,使得南方与中原重建了连接的纽带,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因此,元代南方士人在中原旅行的意义,绝不仅仅意味着旅行空间的扩大,它更有着修复南北共同记忆、重建国家统一意识的重要历史价值。

关于元代南方士人的北上旅行,学界多有论述。陈得芝较早关注到宋元易代后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指出南北统一后,南士纵游齐鲁燕赵,观览中原文物,逐步认同元朝的天下正统地位。^⑤ 申万里关注南人在大都的游历活动,指出南方士人在前往京师求宦的过程,不仅将儒家思想和政治理念带到大都城的政治舞台进行宣传,而且在游历北方的过程中,还感受到京师的壮观,强化了对元政权的向心力。^⑥ 一些研究则深入到南方士人北上旅行的政治认同问题。如黄二宁认为元代南人北游具有文化寻根的意味,重点关注他们在曲阜阙里的游历活动。^⑦ 王筱芸关注到南方士人的北游文学,他们或吟咏沿途风物,或古今兴衰之感,也逐步建构起对元朝的政治认同。^⑧ 目前,学界对元代南方士人在中原旅行的研究,或着眼于曲阜阙里等地域个案,或是留意于南人北游的宏观叙述,对于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与南北统一意识重建的关联,尚未展开充分的系统性论述。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置于南北统一的历史脉络下考察,揭示南方士人对南北共同认可的统一意识的再次确认及其历史影响。

①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册,第472—473页。

② 李治安:《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③ 姚大力:《重铸“天下”一统的伟业: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01—303页。

④ 关于中原的确切范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大体而言,较为通行的说法,中原是指黄河下游地区,包括现今行政区划的河南省大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南部、安徽省北部、江苏省北部等地。

⑤ 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⑥ 申万里:《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

⑦ 黄二宁:《元代南人北游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⑧ 王筱芸:《蒙元西游、北游文学与蒙元王朝认同建构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一、南宋士人的中原想象与北上踏勘

中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起源地,也是宋王朝立国龙兴之所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宋室被迫南渡之后,南宋君臣均以失去故土为耻;绍兴和议后,南宋朝廷及士人集团收复中原的意愿依旧强烈。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人南侵败盟,信州弋阳人陈康伯在为宋高宗草拟的亲征诏书中,以高宗之口,痛斥金人入侵使其“遭家多难”;面对父兄被拘,祖陵废祀,高宗表示“衔恨何穷”,要大小臣工戮力一心,雪耻恢复。^①南宋朝廷为宣示自身华夏正统的地位,长期鼓励、支持中原百姓脱离女真人的统治,南下至宋统治区避难,称为“归正人”。^②高宗朝中书舍人、苏州人李弥逊为庞琳、王宗等人所书的归正制书中,赞扬他们在中原沦陷的背景下,仍然“守节仗义,不变于夷”,毅然率众来归,为此朝廷奖掖晋官三等,示以“异恩”,加以宠荣,鼓励他们为恢复中原立功,“益图报称”。^③

不仅是被迫南渡的皇室、流离失所的北方百姓有着深厚的故土情节,强烈要求收复被女真人占据的中原,就算是原籍南方的士人也有强烈的中原情节,将中原沦陷视作彻骨之痛。越州上虞人李光,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仕途沉浮于南北宋之际,曾三任吏部尚书,绍兴八年与秦桧同任参知政事,后遭贬黜流放。亲历靖康之耻、一路追随高宗从汴梁到临安的李光对于中原沦陷极为痛心,赋诗感叹“中原困干戈,衣冠沦异域”,忠臣义士则有“切骨”之痛。^④祖籍婺源的朱熹祭拜高宗朝北伐名将张浚的坟墓以明恢复中原之志,称张浚“西征奠梁益,南辕抚江湘,士心既豫附,国威亦张皇”,在他北伐功败垂成后,“谋适不用”。而张浚去世,朝中主战派势微,当权者中力主兴兵收复故土之人渐少,“志士日惨伤,中原尚腥羶”。^⑤与朱熹同时的永康人陈亮也称南渡四十余年,陷入女真人统治的中原遗民“嗷嗷无告”,而收复故土是臣子之夙愿,“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独畏其强耳”。^⑥朱熹的弟子黄榦称中原沦丧为“臣子之至痛”,“仇耻之未雪,竟土之未复,中原之地化为腥羶,江南之民疲于岁币”,称南渡以来八十余年,圣君贤相无时不想收复中原,“一洗祖宗之大耻”。^⑦

南宋朝浓厚的中原情结,长期影响着君臣的朝堂论政和对外政策。李纲上奏高宗请求驾幸建康,谋划北伐大业,他以汉高祖于汉中,光武帝于河内,唐肃宗于灵武的历史典故,提醒高宗不忘收复故土。他认为朝廷应摒弃保全东南为全国之计的心态,“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犹污于腥羶为可耻”,“祖宗之境土,岂可坐视沦陷,不务恢复”,若是“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得

① (宋)蹇驹:《采石瓜洲晁亮记》之《绍兴辛巳亲征手诏》,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页。

② 裴淑姬:《试论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政策——以科举、授官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宋)李弥逊:《筠溪集》卷5《庞琳王宗等归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35页。

④ (宋)李光:《庄简集》卷1《伯寓知府给事宠和子賤与仆域字韵诗格力超绝辄复次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第434页。

⑤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拜张魏公墓下》,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374页。

⑥ (宋)陈亮:《陈亮集》卷2《中兴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页。

⑦ (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4《与或人》,《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8页。

中原百姓绝望,人心一失,则复国永无可望。^① 孝宗即位以后,一度有意收复中原,朝堂上反对和议、主张兴兵再战的声音逐步强大。右言正陈良翰认为绍兴和议使“山陵隔绝,疆场无备”,且大失北方遗民之心,“北方忠臣义士来归我者反为虏用,而致怨于我”。对于金人提出归还唐、邓、海、泗四州作为隆兴议和的前提,陈良翰称:“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绝不可割让。^② 乾道七年(1171),秘书省正字蔡堪上书宋孝宗,“故疆之侵未归,陵寝之祀未修,二帝在天之愤未雪”,皇帝即位十年以来“未明求衣,日昃不食”,“未尝一日不在中原也”。^③ 致力于恢复中原的陆游曾入四川安抚使王炎幕府,勘察川陕一带边境军情,制定对金作战计划,在军旅途中表达收复中原的决心,“汴洛我旧都,燕赵我旧疆。请书一尺檄,为国平氏羌”。^④

在宋金对峙的大部分时间内,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尚能保持和平,然至蒙古人崛起漠北草原,南下进攻金朝,北方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嘉定六年(1213),当时颇有人望的理学名臣真德秀上奏指出金朝在蒙古人打击下迁都汴梁,正是金朝衰亡之兆,“其强敌外攻,大臣内畔,戎酋废殒,骨肉分争”,也是宋人收复中原的“天命离合之机”。他指出,“女真腥秽河洛余八十年,中原遗民堕在涂炭”,若趁此机会,“进修圣德”,“发政施仁”,励精图治,静候天命之机,则有望恢复中原故土。^⑤ 金朝在蒙古人打击之下日益衰微,部分宋人乐观地认为可以火中取栗,趁机收复中原,黄榦就上奏称“胡运日衰,中原故壤,指日可复”。^⑥ 但真德秀提醒宋廷,金朝在蒙古人威逼下南迁,虽是收复中原之机,然亦绝非南宋之福,乃是“吾国之至忧”,需防范金人南侵取偿,“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金蒙相斗,南宋也无法独安,“豺虎斗于中原,狐狸嗥于境上,危机交急,不同常时”,唯有君臣上下励精图治,削去浮华,修明内政而观时变。“惟当养民抚士,一意复仇……削去虚文,颺行实政,百司庶府,轮奂一新”。^⑦ 南宋面对比女真人更具草原特质的蒙古人,在“复仇大义”和“夷夏大防”的观念影响下,反对和议成为对蒙政策的主流,而蒙古人南侵与议和并行的政策,更坐实宋人对“夷狄”无信义的忧虑。因此,在南宋后期,拒绝和议、军事对峙成为宋蒙关系的主流。^⑧

激烈的对抗使得南北交通隔绝,绝大多数南方士人终生难以亲至中原,只能想象曾经的故土。颍昌阳翟人曹勋在靖康元年随宋徽宗一道被押送北上,受半臂绢书,自燕山逃归。建炎元年(1127)向宋高宗上御衣书,请求招募死士,自海路营救徽宗。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后,曹勋充报谢副使出使金国,劝金人归还徽宗灵柩。他寓居临安,常思中原,“飞魂常故国,举目念殊乡”。^⑨ 南宋士人尤其关心留在中原的故国遗迹是否被毁,父老乡亲生活是否安好。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公遡随官军南下四川等地任官,累迁兵部员外郎,其诗云:“故国边声静鼓

① (宋)李纲:《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议》卷40《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续修四库全书》第4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02页。

②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7《敷文阁直学士陈公行状》,《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527页。

③ (宋)蔡戡:《定斋集》卷11《馆职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第685页。

④ (宋)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卷6《江上对酒作》,钱忠联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1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8页。

⑤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3《直前奏札一》,癸酉十月十一日上,《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669页。

⑥ (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2《广储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第538页。

⑦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3《直前奏事札子》,《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甲戌七月二十五日,第676—677页。

⑧ 方震华:《复仇大义和南宋后期对外政策的转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2分,2017年。

⑨ (宋)曹勋:《松隐集》卷11《寄吴思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册,第6页b。

鼙,依然宫阙泪沾衣,端门晓日乌声乐,别殿春风燕影归。目断楚天嗟树隔,梦还梁苑逐云飞,里中父老今谁在,闻说比邻半是非。”^①在诗文中,晁公遛在梦中化为飞鸟而回到中原,想象着故都宫殿别苑荒草弥漫,荆榛灌丛,沦陷区的乡里父老在女真人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郓州(今山东东平)人王质寓居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少即有恢复中原之志,因不能亲至中原,他就与朋友姚明相约神游中原,想象着他们东绝黄河,跨龙门,历砥柱而直至黄河之源,登泰山,望沧海而观日出,至咸阳,访秦漠之故都,又北到长城,数饮马之窟,称之为“游无穷”。^②南宋士人对中原的忧伤思念,还常寄托于具体的物象。有些南宋士人来到北部边境,登高遥望中原故土,表达江山半壁、壮志难酬的愤恨。黄岩人戴复古曾至淮河一线,作诗云:“乾坤限南北,胡虏迭兴衰。志士言机会,中原入梦思。”^③南宋普通大众不可能亲至中原了解真实的故国近况,所以留存故土信息的舆图等旧物就成为南宋士人怀念中原的精神寄托。清源人胡仲弓常赏观精心保存的《中原指掌图》,在图上题诗表达对故土的挂念,“月明空照八陵碑,玉馆琼楼失旧基,故国不堪回首处,西风满地黍离离”。^④他想象自己回到了中原故土,见到故宋宗庙、陵寝已然颓废,为梦中的悲惨景象感到痛苦。

在南北军事对峙的隔绝状况下,南宋士人获取到的中原信息是有限且模糊的,可信程度亦颇堪怀疑,大多出于自顾自的想象。而南宋朝廷派出与金朝、蒙古国交涉的使臣,尽管是在严密的监控下,却有机会亲眼考察中原的实际情况。他们归国之后,还应朝廷的要求,撰写行程录以供资政。^⑤在南宋使臣撰写的诸多北行录中,以楼钥《北行日记》与范成大《揽辔录》最著,两人文名较盛,仕宦亦较显赫,颇为时人及后世所关注,其对中原的描述在南宋士人中颇具典型性和影响力。

鄞县人楼钥是在乾道五年十月由舅父汪大猷辟举,充任书状官,出使金朝祝贺翌年元旦,《北行日记》是他途中所记。学者注意到,与被四库馆臣篡改的单行本相比,宋刻本《攻媿先生文集》中留存的《北行日记》反复使用对金国的歧视性词语,严辨华夷之别,着重凸显故国颓败和敌国“蛮夷”的意识形态。^⑥在楼钥笔下,故都疮痍满目,路途中“古冢相望,发掘无遗”。汴梁城虽然经过金朝兴修,表面上“城楼雄伟,楼橹壕堑壮且整,夹壕植柳,如引绳然”,但是前朝文化遗迹遭到严重破坏,景德开宝寺二塔、七宝阁寺、上清储祥宫则是“颓毁已甚”。他关心沦陷区百姓是否已经“胡化”,在汴梁城,他看到围观群众中的老人多叹息掩泣,称呼他为“宣和中官员”,仍留存着前朝的历史记忆。他庆幸中原百姓仍然保留华夏衣冠服饰,感叹“此曹虽久沦左衽,犹知自别于夷虏如此”。^⑦在路途中,他还留心华夏古迹的保存情况,行程中特意观察过徐州季札挂剑处、虞姬墓、沛县的汉高祖庙、商丘的商代遗迹、信陵君封地、雍丘县的故杞国遗迹、汤相伊尹墓等。整体来看,楼钥北行途中感叹中原陆沉,荆棘满目,故宫黍离。他称中原为“戎马场”,故国为“虎狼窟”。^⑧楼钥谴责金朝对华夏古迹的破坏,认为中原百姓在女真人统治

① (宋)晁公遛:《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14《即事》,《中华再造善本》第375号,第4册,第1页a。

② (宋)王质:《雪山集》卷7《游无穷室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415页。

③ (宋)戴复古:《石屏诗集》卷5《淮上寄赵茂实》,《四部丛刊续编》第66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0页。

④ (宋)胡仲弓:《观中原指掌图》,(宋)陈起编:《江湖后集》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第873页。

⑤ 胡传志:《论南宋使金文人的创作》,《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⑥ 李贵:《楼钥〈北行日记〉的文体、空间和记忆》,《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⑦ (宋)楼钥:《攻媿先生文集》卷119《北行日记》,《中华再造善本》第383号影宋四明楼氏家刻本,第48册,第23—35页。

⑧ (宋)楼钥:《攻媿先生文集》卷68《跋百醉老人诗》,《中华再造善本》第383号,第28册,第8页。

下仍艰难顽强地保留着华夏认同。

范成大于乾道六年以资政殿大学士出使金朝,他也关心北宋故都的状况。他表示,经过金朝的整修,汴梁“无复旧观”,虽然“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但东御园“颓垣荒草”,城内民居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居民困顿,“苟活而已”,旧的宫观、寺宇无不颓毁,此情此景,“使属官吏望者,皆陨涕不自胜”。他关心沦陷区百姓的生活习俗,华夏文明能否保留。他失望地记述说:“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①与楼钥相似,他在出使路途中,亦留意中原沦陷区的华夏历史遗迹。考察过的历史古迹包括灵璧县的虞姬墓,商丘的雷万春墓、宋王台和张巡、许远庙,雍丘县的伊尹墓,陈留县的留侯庙、孟姜女庙,汤阴县的扁鹊墓、姜里城,相州的秦楼、翠楼、昼锦堂,邯郸的廉颇、蔺相如墓等。范成大留心探视历史典籍记载的华夏文明胜地,睹物思情,文字中透出对于中原故土沦陷于“夷狄”的悲痛心情。

综上所述,受到南北军事对峙的影响,南宋士人若非奉使、受俘等原因,鲜少涉足中原大地,而出使者受到华夷意识的影响,认为中原是被“夷狄”窃据的“故土”,华夏文明遭受了严重破坏。他们想象着中原的故国遗民日夜期盼南宋“王师”北伐救其于水火,而作为华夏正统所系的南宋面对强大的“夷狄”,则要等候天命,北伐中原,恢复“旧疆”。

二、王朝更迭与元初南方士人中原认知的转变

宋元易代之初,受到原有华夷观的影响,南宋遗民对元朝统治下的中原依旧充满着陌生、畏惧的情绪。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攻占临安,南宋上传国玉玺及降表纳土归附。元朝要求南宋派遣宰执重臣亲往草原朝觐,谢太后遣左丞相吴坚、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枢密院事刘昱充任祈请使,二月启程进京献降表。祈请使团是宋元易代后首批北上中原的宋人群体,使团的行程由阁门宣赞舍人严光大记录。严光大在北行途中称自邳州以北服饰大异于江南,“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别矣”,而中原残破衰败,远不如江南繁华,“城壁圯颓,民居荒芜,自此经过州县只如此。”只是到了山东东平,严光大见到曲阜阙里的“宣圣庙圣像”,殿宇宏丽雄伟,倍感亲切,称“此处风俗甚好”,夸赞“一路经过,惟此为最”。^②三月,元廷驱押宋恭帝、全太后、嫔妃、外戚、官员以及太学生等数千人前往元大都。据说,昭仪王清惠途经汴梁城外夷山驿,感伤题壁赋词,见到曾经壮丽辉煌“玉楼金阙”已经“繁华歇”,令她“泪盈襟血”。^③

中原旅行之所以给严光大、王清惠等南方士人留下恐怖压抑的感受,主要是和这一时期北上宋人的政治身份相关,他们大多数是被强行押送,离家去国,怀着凄凉悲苦的心情。宫廷琴师汪元量随行北上,经过原来宋蒙国境的淮水,想到要去“草木腥”的北方,有着“长亭一夜浑无寐”的忧伤,在徐州城楼上遥望中原大地,眼前则是“更上层楼见城郭,乱鸦古木夕阳红”的景象。^④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文天祥在潮阳兵败被俘,不久被押解北上,途中留下百余篇的

① (宋)范成大:《揽轡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13页。

② (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9《祈请使行程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205页。

③ (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5页。

④ (元)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1《题王导像》,卷2《淮安水驿》、《徐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页、33页。

纪行诗。他在离开宋蒙交界的淮河时,也明显感受到中原迥异乎南国的异样景象,“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围。隔溪胡骑过,傍草野鸡飞”。^①文天祥与其他南方士人一样,早有游历中原的愿望,限于南北军事对峙不能如愿,感叹“吴会偏王业,中原隔遗黎”。不过文天祥作为南方士人领袖,他的北上感怀不止于凄凉苦楚。他视中原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渴望见到源远流长的黄河,高耸巍峨的太行山,甚至希望能探访汉唐故都所在的洛阳,拜谒孔子故里的圣像,到泰山读碑,至函谷怀古,期待着“平生几两屐,汗漫以为期”。如今天下重归一统,遗憾自己却只能以“楚囚”“槛车客”的身份游览中原,饱含着对故国、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苦行。^②走在“芳草中原路”上,心中怀着“斜阳故国情”,对于文天祥来说,这“故国”却只能是南宋。^③

追随着文天祥的北行,不少南宋的遗民也来到中原旅行,参观残存的北宋遗迹,寄托对故国的追思之情。曾参与文天祥幕府,兵败避居家乡的庐陵人刘辰翁说“天下南北车书通,行人点点过汴宫”,遗民来到故都荒废的“艮岳”,心怀“黯惨”的情绪。^④江西永丰人罗公升,父辈曾参与文天祥义军抵抗元军,他在宋亡后,倾资北游,图谋恢复。罗公升来到经过金人改建及金末战乱焚毁的汴梁,这里除艮岳还残存石构遗物外,北宋王朝遗留的历史古迹已然不多,他只能来到北宋皇家寺院之一的相国寺,追忆前朝,“白壁犹书唐岁月,都城更记旧朝廷。如何六代明天子,不及缁衣独有灵”。^⑤他一路来到孔子阙里,参观当地规模颇壮的文庙,中有儒生十数人,“然无一可语者”。邹鲁本是儒风浸染之地,他批评在元朝的统治下,阙里竟“弦诵久无声”。^⑥罗公升将北行的诗文编成《燕山行稿》,赠予友朋,同乡何中就曾读过。何中之父何天声、伯父何时都参与过文天祥的抗元义军,“文丞相建都督府,皆置幕下”。^⑦兵败后流亡闽、粤等地。何中称罗公升在中原“万里行”凝结的诗文“惊人”,“夜窗灯火”下读到这些诗,感到“一段奇愁贯地脉”。中原本“河山壮观”的“帝王州”,如今“万雉城荒土花雨”,故国的痕迹“去无踪”,只剩下“萧条艮岳摇秋风”。何中说罗公升的北行有“千里万里种奇语”,笔下的中原是“牛鬼蛇神万妖舞”之地。^⑧

元初南方士人在中原旅行的心情极为复杂,他们之所以能回到日思夜想的中原,是因为元朝完成了南北大一统,代价却是南宋已然灭亡的残酷现实。吴澄送南宋前朝黄姓进士前往阙里拜谒,感慨称前辈是“绍定遗老,德祐朝士”,如今年已六十有七,犹愿跋涉游历中原,“纵观宋氏百五十余年欲至而不得至之邦,其可喜也夫?亦可悲也夫?”^⑨安徽绩溪人汪梦斗是元初较早受召入京的南方士人,至元十六年(1279),他也怀着悲喜交加的心情北上。汪梦斗认为北上中原是超乎想象的旅途,他采取今昔历史对比的叙述策略,表达北上中原旅行的自豪。他认为

① (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4《桃源道中》,《国学基本丛书》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03页。

② (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4《远游》,《国学基本丛书》下册,第507页。

③ (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4《小清口》,《国学基本丛书》下册,第503页。

④ (宋)刘辰翁:《须溪集》卷7《送李鹤田游古杭》,《豫章丛书》第153册,南昌古籍书店、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第48页a。

⑤ (宋)罗公升:《宋贞士罗沧洲先生集》卷2《相国寺》,《续修四库全书》第1321册,第610页。

⑥ (宋)罗公升:《宋贞士罗沧洲先生集》卷1《东平府文庙规模颇壮其中亦有儒生十数然无一可语者》,《续修四库全书》第1321册,第607页。

⑦ (元)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卷8《何先生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53页。

⑧ (元)何中:《知非堂稿》卷4《读罗时翁燕山行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4册,第469页。

⑨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30《送黄通判游孔林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18页。

南宋时南人北上,“至淮极矣”,就算是在北宋,“亦止于白沟矣”,今日得益于元朝一统,他可以“逾淮,又逾白沟”,甚至到大都城。然而北游面对的却是故国沦丧的现实,“可喜也夫”,“可悲也夫”。^①一路北上,中原丰富的华夏古迹遗存尤其引起他浓厚的兴趣。铜山县吕梁洪的宣和碑,沛县的伍子胥庙,彭城的汉高祖歌风台,鱼台县的古城,汶上县的梁彦章庙,茌平县的马周庙等,他皆有咏叹之作,每至一地,借古抒情。与被押送入京的文天祥等人不同,奉召入京的汪梦斗并非罪囚,北行诗文中没有对元朝统治特别不满的情绪。与汪梦斗类似,元初南方士人以北行录、北行诗等命名的作品颇多,这些饱含中原中华文明现状信息的诗文被带回南方后,受到南方士人的热烈追捧,各种题跋、和韵、联句、赠序等在元代文献中并不鲜见,甚至结集出版。若干年后,汪梦斗的绩溪同乡舒頔读到《北游诗集》,题跋中就认为汪梦斗北游关注中原“城郭之华侈,江山之壮丽,宫阙之雄奇,人物之都会”,虽然也有易代之际常有的“郁悒不平语”,但是内心“林泉丘壑之意深,而风云湖海之志澹如也”。^②像汪梦斗这样奉召北上的南方士人,已经没有了收复故土的幽怨愤恨,只有朝代更迭、物是人非的兴亡感叹。

一些曾经激烈对抗过元军的南方士人,经过中原旅行后,缓解了易代的焦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原的旧有认知,甚至是对元政权的态度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信州玉山人王奕,淳祐四年入太学,宋末,官至玉山教谕。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谢枋得在信州团结民兵,王奕都曾组织玉山民众响应,兵败后与谢枋得隐居玉山数月,后流亡福建等地,待局势稳定后,他回到玉山建起书院,以逸民自居。至元二十五年,元廷征召谢枋得北上,王奕从福建一路送行至山东一带,途中两人诗文唱和,在山东菏泽,他赋诗“君臣分义如能尽,天地鬼神终不忘”,^③鼓励谢枋得坚守臣节。送行谢枋得后不久,王奕发起东鲁义约,相约共游曲阜阙里,他说自己仰慕“阙里宫墙久矣”,此前“关河之隔,朝廷疆里”,故不能亲至。如今天下一统,“九域既一、关河无阻”,阙里“既在邦域之中”,“何自弃门墙之外,愧圣师夫子”。他邀约同志,“或负笈,或携琴,徜徉于长亭短驿,可乘舟,可策蹇,吟咏乎名山大川,览天地之六经,吊圣贤于千古”,他还详细描述了中原旅行的计划:“观黄河,登泰岱……过盘谷,访南山。”^④至元二十六年八月,王奕与同游者来到阙里举行祭孔典礼,祭孔文章中表达借助在统一后北上游历的激动心情:“江南儒生王奕等,幸际天混图书,气通南北,不远数千里,谨袖瓣香,致奠于先圣至圣文宣王。”以往南宋士人只能想象阙里的祭孔盛典,“欲往从之,江汉阻修”,如今“九域甫一,可舆可舟”,是元朝统一帮助王奕实现了平生夙愿。^⑤王奕等人不仅参加了祭孔盛典,还陆续参加了祭祀颜渊、子思、孟子、曾子等的活动,同鲁地儒生、圣裔子孙举行了春秋祭丁等活动。在八月望日,王奕等人穿深衣,抱琴奠酒,歌《南风》,当地儒学教授及颜氏后裔环立以听。他还来到泰山怀古,在安仁殿题壁,参汉柏,观汉武帝的封禅坛,同样表达出“与圣贤邦域,同一乾坤”的心情。^⑥遗迹、文物是历史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南宋遗民通过在中原的旅行,感受到中原醇厚的华夏文明,唤醒了内心的历史认同。

随着元朝统一,南北道开,关隘尽撤,南方士人北上中原游历一时之间蔚然成风。北上旅

① (宋)汪梦斗:《北游诗集》,《宋集珍本丛刊》第86册,第58页。

② (元)舒頔:《贞素斋集》卷3《跋汪杏山北游诗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第588页。

③ (元)王奕:《玉斗山人集》卷2《和叠山到山阳郡学四诗》,《丛书集成续编》第108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751页。

④ (元)王奕:《玉斗山人集》卷1《东鲁义约》,《丛书集成续编》第108册,第738页。

⑤ (元)王奕:《玉斗山人集》卷1《奠大成至圣文宣王文》,《丛书集成续编》第108册,第738页。

⑥ (元)王奕:《玉斗山人集》卷3《沁园春·见王肯堂》,《丛书集成续编》第108册,第762页。

行者的身份不限于遗民。戴表元说,“东南慷慨士大夫,异时局于地狭,不得远游以为恨。自中原道开,游者响奔影赴,惟恐居后”。^①不少南方人是为仕途北上,北上求官的南方士人在中原的旅行就有着不同于遗民的感受,表现出对元朝政权的认同。至元二十二年,临海人陈孚以布衣向行省上《大一统赋》,由荐举署上蔡书院山长,任满谒选京师,得以游历中原。^②考察陈孚从临海至大都求官的交通线路与当初被押送入京的汪元量、文天祥等人几乎一致,然而身份不同,对中原的认知就有了明显差异。陈孚经过了原宋蒙边界的邳州城,前述严光大、汪元量、文天祥等在此满怀着悲凉愁苦,陈孚却描述此地自然风光迷人,“沂水碧潺潺,汀沙白鸟闲”,在此抒发“烹鱼呼浊酒,一笑夕阳间”的豪情。^③罗公升经过山东东平府时,批评当地文庙“弦诵久无声”,“无一可语者”。汪元量也曾奉忽必烈旨至阙里祭孔,虽然场面颇盛,“堂堂圣像垂龙袞,济济贤生列雁行”,不过在汪元量看来,阙里之地儒风不彰,衣冠断绝,学者寥寥,“可怜杏老空坛上,惟有寒鸦噪夕阳”。^④然而陈孚经过东平府,赞叹当地“故侯敦学校,俊士乐弦歌”。他认为在元朝统治下,阙里儒风兴盛,士人以弦歌雅诵为乐,颇有邹鲁遗风。^⑤北行的南方士人感受到中原浓厚的华夏文明氛围,对中原的认知也从陌生、恐怖转变为熟悉、亲切。

三、南方士人中原考察中的苦行踏勘与舆地治学

元朝统一后迎来了和平环境,南北不再有烽火硝烟的阻隔,激发出南人北行的热情。临川人艾庭梧说:“吾生四十年前,欲一望大河之外,不可得。今幸遭盛明,极日月所出,车辙马迹皆可至。”^⑥南方士人的北上动机是多元的,或为仕途奔走,或为游历治学。尽管动机各不相同,但在北上旅途中,大多注意借机探访考察久违的中原故土。江西人王谦道弱冠时曾在南宋各地游历,但受制于南北对峙,“足目所及,海之北,江淮之南而止耳”。南北道开之时,他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仍计划渡过江淮,至徐、兖,历青、齐,放览赵、魏之郊,直抵大都,“一观上国之光”。王谦道称“此我之志也”。^⑦括苍朱彦昭至杭州寻同乡徐一夔,声称自己计划北渡长江、淮河及泗水,游历故都汴梁及邹鲁之地。徐一夔鼓励他趁时远行,在南宋时南北隔绝,“天下用兵,疆场彼此,跬步阻绝”,即使是有志之士有意游历中原也无法成行,如今“天下一国,四海一家”,南人北上大都,南至岭南,“谁复何问”,鼓励朱彦昭值此英妙之年,于太平盛世广泛游历。^⑧

尽管元朝统一带来了和平的环境,但是南方士人背井离乡前往遥远的中原旅行仍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除了身体健康外,还需要勇气和坚决的意志,更需要足够的财力供应高额的长期旅行开支。由南方到京师,行程近五千里,“水浮江淮,陆走徐兖,舟御輿曳,累数月然后至。至则米珠肉玉,旅食费良苦”。^⑨元末温州大儒史伯璿笃志朱子

① (元)戴表元著,陈晓冬、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卷14《送郑圣与游阙里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② 《元史》卷190《陈孚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39页。

③ (元)陈孚:《陈刚中诗集》观光卷《邳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620页。

④ (元)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3《孔子旧宅》,第105页。

⑤ (元)陈孚:《陈刚中诗集》观光卷《东平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623页。

⑥ (元)程钜夫著、张文澎校点:《程钜夫集》卷15《送艾庭梧序》,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⑦ (元)程钜夫著、张文澎校点:《程钜夫集》卷14《送王谦道远游序》,第166页。

⑧ (元)徐一夔著、徐永恩校注:《徐一夔集》卷5《送朱彦昭北游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⑨ (元)许有壬:《送朱安甫游大都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8册,第84页。

学,著有《四书管窥》等,四方弟子多来问学,在温州当地享有很高声誉,同乡周天民就问他何不北上游历以广见闻。他解释说:“家无应门之童,有垂白之母,才不逮人而齿复衰暮,故不得以老朽之躯,侥幸其所难。”^①若家有需要奉养的老人孩童,无疑是外出旅行的牵挂。漫长外出游历的路上,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也折磨着远游的南方士人。平阳人陈高在游途中发出“禽鸟各有巢,我行独无家,蔓草野多露,渺渺天之涯。亲识不在傍,四顾长咨嗟”的感慨。^②长途跋涉中遭遇艰难险阻,身心疲惫。临海人陈基北游,曾经渡河洛,上嵩山,过秦汉故都,览圣贤遗迹,又自孟津渡河,逾汲郡,达燕赵。在路途中,“炊不暇熟”,与同伴王季野“相与为休戚”,“关山萧条,仆马憔悴,而心神梦寐”。^③茶陵人陈泰在北上游宦中也遭遇饥寒交迫的困境,感叹“恨身不及生北方,出门万里无赢粮,饥鹰志岂在狐兔,日暮啄雪犹彷徨”。^④

南方士人付出金钱、精力,克服种种困难的中原游历绝不仅限于饱览壮丽山川美景,他们以极顽强的意志行走在广袤的中原大地,探寻废墟上的历史遗迹,苦行踏勘的动力来自中国古代士大夫舆地考察的治学传统。至大元年(1308),仕宦不遇、正南返居乡的吴澄勉励同乡何中北上中原,劝说他北行就算仕途上一无所获,也可以借此机会,实地考察久违的中原山川风土,亦为人生幸事。“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⑤奉化人戴表元认为山川风土孕育人的性情气质,北方中原的巨野平川、洪河乔岳,孕育了人的雄浑深厚;南方山水孕育出人的清纤峭丽、奇伟瑰秀,各有短长,所以古往今来的“通人硕儒,强志力学之士”要通过游历来增长见闻,涵养心性。故太史公司马迁生于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稍长,就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以广其记览。吴国公子季札虽早习文学,而不惮北游齐、晋、鲁、卫诸国,日与中原贤士大夫讲经论礼。戴表元认为先贤跨越南北地域的游历就是希望摆脱出生地域带给人的局限性,“以求去其陋固,盖不以生而受焉为足”。^⑥至顺二年(1332),已经八十三岁的吴澄勉励清江人徐镒北游,表示中原有着迥异于江南的风土,有宽阔的河流,绵亘的山脉,雄大的都邑,壮丽的宫殿及朝堂上名卿巨儒,“目识若为之增明,心量若为之加宽,此身似不生于江南遐僻之陋也”。^⑦舆地考察不仅能提升学识,更能涵养心性道德。已年逾五十的豫章杨显民趁着“朝廷清明、海内为一”,计划渡秦淮,历齐鲁之墟,过泰山,拜孔林,至京师。安仁人李存勉励他说君子外出游历在于“明王道,穷义利之辨,进德修业”,此志“虽老而不休”。^⑧

元代南方士人认为中原旅行不同于传统士人寄情山水的旅游,也非单为追求名利,而是应有鲜明的治学取向。何中受邀北上游历,在大都城前后两个月,终未得一官半职而归,临行辞别朝中诸名士,表示自己北上是为考察中原舆地,非为求富贵显达。“故欲登泰山以观天下之大,过孔林以礼先圣,上金台以阅神京之盛观,返东阿以审济水,度河之否,历沧景以辨九河瀚海之伪真,过九江以讯九江之是非”。他将此行所得舆地知识整理成书,详细考察古今沿革,

① (元)史伯璿:《青华集》卷1《送周天民北游序》,温州图书馆藏旧抄本。

② (元)陈高著、郑立于点校:《陈高集》卷3《行路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③ (元)陈基:《夷白斋稿》卷22《飞云楼诗并序》,《四部丛刊三编》第70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页b。

④ (元)陈泰:《所安遗集》之《万里行》,《丛书集成续编》第109册,第514页。

⑤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9《送何太虚北游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346页。

⑥ (元)戴表元著,陈晓冬、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卷14《赠曹子贞编修序》,第294—295页。

⑦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送徐则用北上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276页上栏。

⑧ (元)李存:《侯庵集》卷19《送杨显民远游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716—717页。

著有《蓟丘述游录》一卷。^①安福人周震震就曾提醒过南方士人,北上游历不应只是追逐名利,奔走权贵之门,趋炎附势,若是对中原的“山川形胜、人物气概、古今壮观、名贤志士之所从出”茫然无知,不暇问,不及知,不过是“徒追逐妄走而已”。^②虞集认为空疏的学问不足以经世致用,他告诫准备出游“燕赵齐鲁晋宋之郊”的刘叔熙,游历途中要认真观察“山川之形胜、封域之离合”,考察“古人之遗迹、风气之变通、习俗之升降、文史之遗阙”,这才是学者之能事。^③金华儒生傅彦高认为僻处江南一隅,无以广见闻,不甘为井底之蛙,准备负笈远游,老师吕浦告诫他,“穷山川之胜,历都邑之壮,访齐鲁之大儒,结燕赵之奇士”,固然能增长见闻,开拓心胸,但是学问之道在于专心致志,朝益暮习,若是心驰神骛,那么远游对于学问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游适足荡吾心,见闻反足壅吾志”。^④

元人认为阅读历史典籍无法代替在中原的实地旅行考察。吴澄送萧九成前往中原考察,就指出治学需要将文献阅读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苟徒稽诸方册之所纪载,而不证诸耳目之所见闻,得无有阙乎?”^⑤有时候实地考察所得的知识显得更加珍贵。庐陵人萧子跃于盛年北游,出门万里,“吊古秦汉旧都,以涉燕赵韩魏之郊,跨泰山、黄河之壮,穷吕梁、碣石之险”。他认为只有实地苦行踏勘,才能得到真正的学问本源,“岂不贤于窥陈编而求源委也哉”。^⑥郑玉送别张伯玉北上大都,认为中原山川道里固然可以按图索骥,但是只有亲眼看到“天下之奇观”的名山大川,才能真正开阔人的眼界,“泛黄河足以发吾深远之思,登太华足以启吾高明之见,历汉唐之遗迹,足以激吾悲歌感慨之怀”。^⑦鄱阳人徐明善送叶惠然北上,鼓励他考察中原的山川河流。他指出南宋诸儒注释《尚书·禹贡》时,对于黄河、济水的水性,积石、龙门等诸山方位,已然陌生,“面势或不合”,其因在于南宋士人长期无法亲自至中原考察,“行不逾淮故也”。他希望叶惠然趁着北游之机,亲履实地考察,“一皆务造其极,则兹游何可已也”。^⑧

随着南方人北游活动深入,他们对于中原輿地考察意义的理解逐步深化,认为南人若不能回到中原大地,则无法理解輿地知识中传承的精神信仰。舒頔认为大丈夫生于国家统一之世,当周游天下,历览山川人物及灵异古迹,就算是人迹罕至的“遐壤幽怪”,也要“悉观毕睹”。唯有如此,方能“贯穿事物之理,融会天人之趣”。他进一步指出中原游历对于士人輿地治学的重要性,“不登泰华,不知夫高且尊焉;不涉江海,不知夫深且险焉;不迹夫通都大邑,不知华侈而繁盛焉;不履夫燕赵齐鲁楚魏之郊,不知夫土之广,生殖之繁焉”。只有游历见识了中原的山川河流、名胜古迹、通都大邑,才不辜负生于“斯世”,成就“闻人”。^⑨新喻人胡行简勉励儒生黄立诚不要沉居里巷,应效仿司马迁,周游四方,“神州赤县之壮,黄河太华之雄,车书之广,人物之懿”,足以愉悦心目,开拓见闻,若能如此,“其进何可量哉”。^⑩茶陵人李祁与来永新州仕宦的山东人刘时中交游,称赞济南为天下名郡,“礼让信厚”之邦,生长其间之人“涵濡乎圣贤诗书之

① (元)何中:《知非堂稿》卷7《元故聘君高圃先生何公隐士世系行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4册,第507页。

② (元)周震震:《石初集》卷6《送刘弘略远游序》,《豫章丛书》第175册,第11页b—第12页a。

③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21《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虞集全集》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50页。

④ (元)吕浦:《竹溪稿》卷4《送傅彦高游学序》,《重修金华丛书》三编第1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⑤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5《送萧九成北上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281页。

⑥ (元)王礼:《麟原文集》后集卷3《送萧子跃远游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476页。

⑦ (元)郑玉:《师山遗文》卷1《送张伯玉北上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第69页。

⑧ (元)徐明善:《芳谷集》卷2《送叶士心序》,《豫章丛书》第172册,第1页a。

⑨ (元)舒頔:《贞素斋集》卷2《漫游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第572页。

⑩ (元)胡行简:《樗隐集》卷5《送黄立诚远游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147—148页。

化”。他与刘时中详论齐鲁的华夏风俗，“与夫圣贤之世系，封爵里居，地理之山川，又物好尚，如指诸掌”，迫切想知道“不知今之齐鲁，犹吾夫子之所谓齐鲁者乎”。他期待有朝一日，“车书会同，行且有日”，亲至齐鲁感受华夏文明。^①

在南人的论述中，中原旅行不仅提升了他们舆地治学的能力，更是提升了自我生命的境界。戴表元说“大抵其人之未游者，不如已游者之畅；游之狭者，不如游之广者之肆也”。在元统一后，他鼓励鄱阳刘仲宽北上中原旅行，交往名家，“当裹粮载笔，与中原燕赵梁宋齐鲁诸名儒，弦歌二南之风，笙镛九成之音”。^② 安仁人李存鼓励乐平鲁志敏出游中原，泛秦淮，过黄河，东登泰山，北走京师，以万里远游锤炼意志，“阅寒暑之变，更历山川之夷险，其间人事之可喜可愕，足以恢弘我、警戒我者”。^③ 鄱阳人榴斗凤有万里远游之志，“绝江渡淮，溯河济，过齐鲁之邦，遨游燕赵间，周回秦汉故都”。在游历中原途中，他时常登高酌酒，吊古豪杰遗迹，时人赞叹他的诗文颇有磊落魁奇之气，受到在朝为官的同乡如虞集、揭傒斯等人荐举，擢应奉翰林文字。^④

四、中原访古与南北统一意识的再确认

对于元代的南方士人来说，前往中原旅行虽是充满艰辛、远离家乡与亲人的漫漫旅途，但是在精神上，却是回到“故土”的返乡之旅。中原乃是历史记忆中祖先居住过的土地，行走在这块土地上，就会发现壮丽的山河景色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南方士人感叹中原是先民世代生活繁衍的固有家园，是“先圣先贤”创造过去“历史”的地理空间。江西广昌人揭祐民多次往返于家乡与北方，“北游燕赵、东至辽，览故都之遗迹”，^⑤ 凡所经行，必有吟咏之作。他称中原风气醇厚，旅行于中原大地，联系起这里是“圣贤所经营”之地，“理者皆先民”。^⑥ 东阳人胡助北渡黄河时，赞叹眼前奔腾不息的母亲河，“黄河之水贯九州，发源西自昆仑丘，浑浑深大江海势，浩浩迅驶东南流”。想到大禹治水和历代的黄河治理，“先民几度为鱼忧”。他在徐州吕梁渡河时也遭遇危险，“万古不平吕梁险，老天永界行旅愁”。他在苏轼修建的徐州黄楼赋诗感兴时，中原早已经不是恐怖异域，这里是“冠带充朝文物盛，桑麻蔽野人烟稠”的乐土。他赞颂元朝以“古未有”的“太平一统”，实现了他“观光万里今重游”的愿望，他希望船只快快远行，至京师献“河清美金颂”，表达出强烈的时代自豪。^⑦

南方士人在南宋时就极为关心中原历史古迹的安危，担忧经过漫长的“胡人”统治，中原的华夏文明会遭到彻底破坏，中原民众会遗忘华夏风俗。临川人艾庭梧在元统一之后，急切北上，意欲“浮游乎齐、鲁、燕、赵、韩、魏、秦陇之郊，问古帝王之所都，圣贤之所起，其余风遗俗，犹有存者乎？”^⑧ 江西人彭华国追寻司马迁的足迹，不远万里来到中原游历考察，他踏勘探寻那些

① (元)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6《赠刘时中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6册，第230页。

② (元)戴表元著，陈晓冬、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卷9《刘仲宽诗序》，第204—205页。

③ (元)李存：《侯庵集》卷20《送鲁志敏北游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721页。

④ (元)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6《榴府君墓铭》，《中华再造善本》第146号，第2册，第4页a。

⑤ (元)揭傒斯、(元)蒋易辑：《皇元风雅》卷10《盱里子传》，《中华再造善本》第742号，第3册，第10页a。

⑥ (元)揭祐民：《皇元风雅》卷10《中原道上次欧阳齐汲韵》，《中华再造善本》第742号，第3册，第6页a。

⑦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5《黄河行》，《重修金华丛书》三编第134册，第774页。

⑧ (元)程钜夫著、张文澎校点：《程钜夫集》卷15《送艾庭梧序》，第183页。

历史遗迹,考察那些记载先人言行的碑刻遗物是否留存。“中原多圣贤遗迹,淡烟衰草中,断碑残础,往往而又有骚人墨客浓墨大字”,看到这些先人的笔墨文字,彭华国题笔附和,“墨汁淋漓,龙蛇现动,飞走壁间”。^① 泰山是中原的华夏圣山,鄱阳人周伯琦称泰山为“神岳”,他登临泰山祭拜时,见到历代遗留的宫阙保存甚好,颇感欣慰,使他想起西汉武帝封禅、东汉光武帝柴望祭山的历史记忆。^②

中原旅行使得南方士人回到历史典籍中的特定场所,联想起典籍中的历史情景,从残碑断础中读取所蕴含的华夏文化信息,重新唤醒内心的历史记忆,从而连接起过去与现在。陈栎认为南人亲至中原,亲见古人遗迹,就能唤醒华夏历史记忆,“追见其当年,以应简编所云”,“因丰水睹河洛,而见禹之功绩,讲业齐鲁而观夫子之遗风”。^③ 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南方士人和中原情感纽带的心理基础,^④通过实地考察,再次确认南方与中原紧密相连的历史过往。陆文圭劝告友人北上过邳州、徐州、汴梁、洛阳等地的宫阙、山川时要留意观察,如在成皋见证楚汉争霸的古战场,在洛阳观大禹治水所遗留的砥柱,在邯郸参观乐毅墓,在徐州观项羽所留戏马台,访古过程中注意要考证相关史实,“访古记宜勒”,“订讹青简在”。^⑤ 江西新喻人傅若金在秋风萧瑟的季节路经古城邯郸,看到沧桑的“故垒”和“荒垣”,联想邯郸的历史,“何王坟墓对山阿,尚忆诸侯战争多”,咏叹典籍记载的秦赵大战及毛遂、廉颇、信陵君等人的事迹。^⑥ 延祐七年(1320),兰溪人吴师道北上途径徐州,参观北宋苏轼所筑黄楼的故基,俯视汴河和泗水交错,“孤城低黯”,又前往西楚霸王项羽所筑戏马台凭吊,与友人吴立夫共同吟诵苏辙的《黄楼赋》、文天祥的《彭城行》等名篇,凄然感怀。^⑦

汴梁是南方士人北游中原的重要目的地,与元初遗民来到汴梁表达出的凄凉悲愤相比,元代中后期的南方人来到汴梁,心态就平和了许多,多从历史理性角度来评价北宋。歙县人洪焱祖来到汴梁城东北隅的艮岳遗址,见到皇家园林已经废为“鞠蔬”之地,已成“野人居”,只剩下“灵壁太湖石”。洪焱祖不再强调女真人灭宋的愤恨,而是将北宋灭亡归结为徽宗佞幸道士,不理朝政,靖康之变乃是“玄门不救青城祸”。^⑧ 周伯琦来到汴梁城,见到元朝统治下的汴梁城颇为壮丽,“严城万雉固金汤”,昔日的宫阙改造成河南行中书省的省府衙署,金明池依旧“四面漾清漪”,舞榭楼台还遗存当年的基柱,“野蝶间鸥”依旧在湖面飞翔。艮岳的太湖石“如今散作人间玩”,北宋东京的繁华只存在于“珠树瑶华一梦中”。^⑨ 南方士人逐步认可元朝统治后,宋朝已不再具有特殊的情感意义,将它和汉、隋、唐并称,进入中国历史的王朝更迭叙事之中。

儒家思想是南北共同认可的情感纽带,南方士人视曲阜阙里为精神的故乡,常以“父母之邦”称之。戴表元送贵溪人郑沂前往阙里朝圣,认为祭拜圣贤是华夏文明的历史传统,“古之君

① (元)王义山:《稼村类稿》卷5《送彭华国北游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30页。

② (元)周伯琦:《近光集》卷1《望泰山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512页。

③ (元)陈栎:《定宇集》卷2《送赵子用游京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275页。

④ 刘迎胜就以金末元初耶律楚材、陈时可与苏东坡铁柱杖在大蒙古国的传递故事,阐明共同的文化背景是中国历经三百余年的分裂,在元代却能弥合南北心理隔阂的文化基础(刘迎胜:《元代主流文化南北界限的消失——以耶律楚材、陈时可与东坡铁柱杖为题》,《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⑤ (元)陆文圭:《墙东类稿》卷15《送陆同知北上二首》,《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618页。

⑥ (元)傅与砺著、杨匡和校注:《傅与砺诗集校注》卷3《邯郸行》,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⑦ (元)吴师道:《吴师道集》卷16《题谢君植吴立夫诗词后》,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7页。

⑧ (元)洪焱祖:《杏庭摘稿》之《艮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第675页。

⑨ (元)周伯琦:《近光集》卷3《汴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537页。

子其身存而人为之式，其闾表其乡，没而百世犹祭其社，礼其丘陇”。他认为孔子为世间立下“风声德义”的万世法则，庇佑万民，“存我如父母”，故天下人万世不能忘怀。^① 虞集称阙里为“父母宗子之家”，鼓励后生李远到阙里朝圣，“章甫逢掖之士，视鲁孔林如支庶流裔，观于父母宗子之家，孰不以为归往瞻仰之地乎？”他认为有志、有时、有力之士皆应该去拜谒。^② 徐一夔认为孔子故里是南人北游的必到之地，“今子之游必至于邹鲁”，来到夫子登临过的泰山，济渡过的泗水，到孔林拜谒坟庙，“请于祠宫，摄衣而进，拜于履前，仰瞻德容之盛”。^③

通过亲身旅行，南方士人再次确认中原是华夏文明的祖源地，重新修复南北统一意识，认可元朝统治下的中原仍很好地保留着华夏文明。数度北游中原的吴澄认为洛阳是“四方中正之地，古先圣贤所萃”，理学开创者邵雍、程颐、程颢皆在此地讲学，其地的理学之风“犹有可闻者”。^④ 陆文圭于咸淳九年(1273)中乡试，宋亡后未出仕，参加延祐科举后，朝廷几度征聘，皆以老病未行，应是具有一定的遗民意识。他称统一之前，江南“声问复不与中华相接”，担忧中原在“胡人”统治的“胡化”风气中，恐怕没有“特立独行之士”能“卓然不为流俗所变”。他说山东是华夏君子之邦，守经学而矜节行，自西周时期齐鲁分封建国至唐宋，礼乐风格沿革不变，然不幸六七十年，遭受金末元初的战乱，“故家遗老，典刑文宪，日以湮坠”。统一之后形成“天下大定，车书同文轨”的局面，道路无壅，南北士人往来密切，“自南而之燕者道济汴，自北而游宦者乐江浙”。从南人北游的反馈来看，陆文圭了解到山东很好保留着华夏文明，“周公、太公之先烈，仲尼、孟轲之遗迹，名臣、贤士之风猷，悉得于所见所闻”。他接触到来江阴为官的山东人丁仲谦，称赞他“遇事辄发，不屈折于物”，有华夏古君子之风，认定山东的“圣贤之流风遗泽，尚有可寻者”。^⑤

南方士人在中原的旅行，不仅是文化上的寻根之旅，也是血缘上的认祖归宗之行。他们通过祭拜先人坟墓的方式，对自身中原血统进行了再确认。平江人朱德润的九世祖朱贯，为北宋朝议大夫、兵部郎中，是历史著名的睢阳五老之一，“与杜祁公等为睢阳五老会，有诗传于世，赠司农少卿”。宋代佚名画家所绘之《睢阳五老图》中就有朱贯的画像。朱德润六世祖朱椿在宋初因避兵祸，渡江侨居姑苏，遂为苏州人。^⑥ 泰定四年(1327)，朱德润在北游途中，特意前往睢阳访祖先坟墓，“想望中原故墟，草木凋谢，丘陇芜没，每一兴怀，不能不感慨于当时也”。^⑦ 南宋绍兴时期的名相赵鼎是山西闻喜人，入元后，居于江南的赵鼎后裔仕元为国子博士，南渡两百余年后回到“故国山河”，赴闻喜祭拜先人坟墓，受到当地乡亲的欢迎。“子弟牵羊辇材酒，里中老父喜更悲”。^⑧ 北宋名臣范仲淹及家人墓地在洛阳南郊的万安山，靖康之变后，范氏子孙大多南迁至苏州，无法到洛阳祭扫祖坟，“弗获以时展墓，唯顾瞻山河，北向流涕而已”。至大年间，八世孙范国俊曾回到洛阳墓地祭拜，当地官员徐景孺恢复了部分墓园规模。至正七年，范国俊之从弟范文英命其子、昆山州教授范廷方“具资粮屣履，不远数千里致其父之命”，前往洛

① (元)戴表元著，陈晓冬、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卷13《送郑圣与游阙里序》，第281页。

②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21《送李仲永游孔林序》，《虞集全集》上册，第550页。

③ (元)徐一夔：《徐一夔集》卷5《送朱彦昭北游序》，第126页。

④ (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5《送翟生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290页。

⑤ (元)陆文圭：《墙东类稿》卷5《送丁仲谦归东鲁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540页。

⑥ (元)周伯琦：《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元)朱德润：《存复斋文集》附录，《历代画家诗文集》第3辑，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322页。

⑦ (元)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5《赠张允道序》，第136页。

⑧ (元)陈旅：《陈众仲文集》卷1《送赵博士丞相还闻喜展墓》，《中华再造善本》第726号，第1册，第16页a。

阳交涉,不忍祖坟成为“刍牧之区”。重修墓园的提议得到当地官员的积极支持,墓园不仅恢复旧时规模,还修建了围墙,补种了绿植,又建屋六间,作为祭祖之所。应邀作记的临海人陈基认为范氏家族洛阳墓园得以重建,得益于范氏子孙“不忘其本”。^①

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有着修复南北统一意识的重要价值,它也促成了南方士人对中原的政治向心力。元末战乱率先起于中原,继而蔓延至全国,南方士人极为关心中原的局势。兴化人成廷珪在元末避乱于苏杭一带,友人杨仲德自汴梁归,得闻战乱导致中原“荆棘蔽野、人烟断绝”,心痛感伤,“北望中原五千里,黄河之水几时清”。^②南方陷入动乱之后,中原在元廷的努力下,局势反倒逐步稳定,不少南方士人不愿陷于“寇贼”,离开已为沦陷区的南方,北奔中原,投身元廷。松江人沈易在张士诚叛元后北走洛阳,投奔河南王察罕帖木儿,被擢升为河南行省理问所知事,河南被明军攻陷后,他还流寓于山东青州一带。^③杨维桢还提到天台、雁荡间有“张先生”,本来隐居避世,受到察罕帖木儿的邀请,不远数千里,投身幕府中,“佐天子中兴”。^④会稽人张宪为杨维桢的门生,本来在张士诚阵营中,后来也同样北上汴梁,投于察罕帖木儿。杨维桢将察罕帖木儿比喻为中兴大唐王朝的裴度,“豪杰归之,唯恐后”。^⑤温州平阳人陈高于至正二十七年渡海北上,投奔察罕帖木儿于怀庆府,奏报“论江南之虚实,陈天下之安危,当何以弭已至之祸,何以消未来之忧”。数月后,陈高卒于怀庆城,在葬礼上,“四方之士,凡自南而来者,皆会哭”。^⑥可见,当时受到中原正统意识感召,前来投奔的南方士人为数不少。

到了元末,南方士人认同的“国”已经从元初遗民认同的南宋变成了以中原所在的大元”。陈高渡海北上,曾表明心迹,“天地腥羶隔,江淮蜂蚁屯。谁施洗兵雨,吾欲扣天阊”。他认为当时动荡的南方已经是“腥羶”之地,他不放弃救国雄心,唯有投奔“天阊”所在的中原。^⑦浦江人戴良和陈高类似,至元二十六年,渡海北上投奔元廷,行前赋诗明志,“结屋云林度半生,老来翻向海中行。惊看水色连天色,厌听风声杂浪声。舟子夜喧疑岛近,估人晓卜验潮平。时危归国浑无路,敢惮波涛万里程”。^⑧尽管渡海北上危险重重,“水色连天”,“风声杂浪”,但是他归“国”的意愿极为强烈,甘冒风涛,克服了海上航行的心理恐惧,将生死已然置之度外。

五、结 语

值得说明的是,南方士人在中原的旅行,之所以能唤起强烈的华夏意识,同元代官方致力于保护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遗迹息息相关。蒙古人虽然来自草原,但早在立国之初,就宣布要继承华夏的政治传统,保护中国历代的文化遗产与精神信仰。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之初就下诏保护前代君臣的墓冢,划界封禁,官予致祭,“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

① (元)陈基:《夷白斋稿》外集《范氏复祖莹记》,《四部丛刊三编》第70册,第36—37页。

② (元)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2《题杨仲德照磨自汴梁归话中原荆棘蔽野人烟断绝闻复山东感而赋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第317页。

③ (元)王逢:《梧溪集》卷5《赠河南理幕沈易之有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第543页。

④ (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3《送张先生赴河南幕府序》,《四部丛刊初编》第245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9页。

⑤ (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3《送张宪之汴梁序》,《四部丛刊初编》第245册,第10页。

⑥ (元)揭傒:《陈子上先生墓志铭》,(元)陈高著、郑立于点校:《陈高集》附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页。

⑦ (元)陈高著、郑立于点校:《陈高集》卷5《丙午元日》,第78页。

⑧ (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9《渡海》,《四部丛刊初编》第243册,第10页a。

臣、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官司,岁时致祭”。^①至元九年九月,中书省吏部明确各地前代君臣祠墓致祭费用支出,神农等“圣帝明王”及三代开国之主,功及万世,泽被苍生,要求所在地方三年一祭,支钞以二十两为限。商丘的微子墓,彭城的留侯张良系“忠义直烈”,为“赞扬风化”,“激励人臣”,均由所在地方致祭。^②不仅在中原,元军占领临安之际,忽必烈同样下诏宣布保护南方的历史文化遗产,要求南宋境内的“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③

元朝再度实现了南北大一统,南方士人通过中原旅行,得以强化了南北分享并认可的统一意识,维系了南方民众对中原的政治向心力。直到元末,朱元璋为争取北方百姓的认同,极力强调明朝的“中原”属性。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等北伐中原,讨元檄文中强调朱元璋乃是生于中原的圣人,“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④洪武元年(1368)五月,明军攻占汴梁城后,朱元璋随即从金陵赶到汴梁,在南薰门外筑台举行庆典,告祭上苍,意图通过在北宋故都以华夏传统的祭天大典唤醒中原百姓对新生明朝政权的认同。^⑤八月,朱元璋下诏以汴梁为北京,诏书中称中原居天下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展现出强烈的中原正统意识。朱元璋意图通过建都汴梁向中原百姓宣布明朝并非占据南方一隅的偏安政权,而是承接天命的中华正统王朝。^⑥学者注意到明朝立国之初就发动了“再造华夏”的全国性政治与社会运动,重建统一王朝的历史系谱,确立了南北统一后儒学的独尊地位,恢复统一后采取华夏的冠服礼制及社会礼仪。^⑦可以说,通过元朝统一后的南北交流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南北隔阂,并对后世中国人的统一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圣政二·崇祭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8页。

②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30《礼部卷三·祭祀》,第1071—1072页。

③ 《元史》卷9《世祖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9页。

④ (明)宋濂:《谕中原檄》,(明)程敏政辑:《皇明文衡》卷1,《四部丛刊初编》第332册,第2页a。

⑤ (明)夏原吉:《一统肇基录》,见(明)冯可宾辑:《广百川学海》甲集,中国书店2015年版,第30页。

⑥ 《皇明诏令》卷1《建北京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8册影印嘉靖十八年刻本,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8页。

⑦ 杜洪涛:《再造华夏——明初的传统重塑与族群认同》,《历史人类学学刊》2014年第12卷第1期。